

书呆温梦录

谢其章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书呆温梦录

谢其章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书呆温梦录 / 谢其章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360-6133-0

I. ①书… II. ①谢…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0599号

责任编辑: 文 珍

技术编辑: 易 平

装帧设计: 礼孩书衣坊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32开

印 张 6.5 6插页

字 数 97,000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5,000册

定 价 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小言：未应长作收书人	1
梅兰芳“蓄须明志”时期的戏外事	5
《青年界》的两个专辑	15
搜求周作人旧版书的乐趣	21
《美术生活》跟鲁迅借了什么画	25
《文学》杂志“战时版”	29
紫兰花开	33
袁殊和《拙政园记》	37
黄萍荪与《子曰》丛刊的结局	42
我与《永安》月刊	58
良友的衣裳	62
这书，是在等我买吧	68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往事	73

香港老牌文史掌故杂志《大成》	78
《大人》	83
黄俊东的三本书话书	89
零九年买书记略	94
我惟一的一篇“邮话”	97
青海读书记忆	101
朱安的北京故居	107
范烟桥最早评论张爱玲	120
现代文学战斗的一翼	126
私人摄影的历史局限	132
上水行船难	137
写字	143
未妨拍桌拾芝麻	147
鱼飞向北海,可以寄远书	154
我所知道的“黄裳和止庵”	161
毛边书是阅读的反动	169
有书乃城	174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书斋	180

蒋彝笔下的英伦风景	186
日本文化的观察者	191
巴黎不设防	196
后记	202

小言：未应长作收书人

起个书名“殊未称意，踌躇旬日”，竟成了难事。最近的一本书便因书名与编辑来来回回交涉了好几回合，最终定下的书名是双方妥协的结果。稍早的一本书，书名五个字，其中“蠹”字很多人不认得，有位读者说得有趣：“五个字就有一个不认得，里面不定还有多少不认的字。”知难而退，这位读者有可能就不买你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书了。我在书名上不大愿意让步，譬如《终刊号丛话》，对方想易“丛话”为“杂谈”，我气得不得了，连夜写信表示不能改，第二天又打长途电话强调不能改。书名有时就是个噱头，瞧瞧现在的某些书名，真令人掩鼻疾走。实在起不出来名字，有个讨巧的办法，从前人的智慧里“借个火”。既然声明是借，就该说清楚出处，

我这个书名是从赵景深先生那借来的，赵景深六十五年前用它在《上海文化》杂志上做过专栏的名字。我收藏有这本杂志。最早是姜德明先生在梳理“书话”渊源时提到赵景深这个专栏。

据称赵景深藏书最完整的时候达三万册，编有藏书目录九本。他去世后，家属将藏书捐赠给了复旦大学图书馆，经过清点，计有线装古籍二千余种，八千余册；中文平装书九千册，外文书二百余册，总计约二万多册。赵景深尽管嗜书，却不吝啬出借。有时买书还买双份，一份便是专门供人借阅的。王骧教授曾赋诗赞颂道：“文坛巨擘老人星，著作等身至可钦。更有一桩人罕及，藏书肯借见胸襟。”赵景深主编过《虹纹》《文学周报》《现代文学》等杂志，他撰写的《书呆温梦录》是早期书话佳作。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第十三页显示的1894年版《海上花列传》，封面盖有“赵景深藏书”之印，使我们得见他藏书的冰山之一角。

我以前是读书的，谈不上手不释卷吧，但总归是爱读的。在农村插队的几年，有一个冬天没有回北京，给自己定了个计划，趁没人的时候读一遍《红楼梦》。1971年2月21日，下了雪，这天我在日记中抄了《青年近卫军》里的几段话，好使

自己振作一点儿,当时的情形确实太糟了。其中这段话值得再抄一遍:“斯塔霍维奇跟所有具有他那种性格的青年人一样,他们生活中的主要的推动力就是自尊心,他可以或多或少地表现的坚强,在人们的面前,尤其是在他接近的或是具有道德威望的人们面前,他甚至可以完成歇斯底里的英勇的行为,但是在单独遇到危险或是困难的时候,他却是一个懦夫。”在那个多雪的孤独的冬天,法捷耶夫的话最是合宜,一向所说的“文学的力量”,照耀到如此偏僻的小村庄。

收在本书里的《青海读书记忆》,同样是我以前喜欢读书的证明。现在看书的条件太优越了,读书成了最轻而易举的事儿,这样反倒使我分外怀念过去的苦日子。我曾在《虹南作战史》的扉页写了一段话:“不可思议三十年前是如何一页一页读完此书的,后人无论如何诠释历史都无法真实地还原历史,那仅是一个念头,一瞬即逝,捕捉不到。青海岁月,帐篷里读这书,帐外呼呼的荒原之风,每个夜晚做完工,将歇时分,这书成了每天的盼头。今日以六元钱购自报国寺书摊,用来纪念三十年前的青海。”

近二十年来,我渐渐由“读书者”转变成了一个“收书者”,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搭在收书买书上,忘乎所以,患

得患失，徒增马齿，一无所成。有人说，每隔一段时间，就应该跳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换一种活法，这样也许你才能明白过去的生活是多么愚蠢。我觉得此话有理，很值得试一试。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日夜于城西老虎尾巴

梅兰芳“蓄须明志”时期的戏外事

陈凯歌导演的《梅兰芳》在全国热映，一股梅兰芳热四处兴起。我收集的旧资料中有关梅兰芳的图片和文字很是不少，我写《文化人结婚记》时，很是不明白当年蓄须明志的梅兰芳，为何要趟那道浑水，后来有著名学者讥讽我的不理解为“见者惊异”，并称梅兰芳“他的底线是不登台，不唱戏，其余都是小节，可不予计较”。若以梅兰芳的底线来衡量另几位名伶，问题就来了，马良连、尚小云、荀慧生，均于敌占时期登过台唱过戏，据此而推论他们的大节，难说没有简单化之嫌，更有扩大化之隐忧，——已有傅斯年“所有伪北大教员不予登用，不能给北大留下耻辱”的一刀切作法。教员是耻辱，教员所教育之学生也该是耻辱，推而广之，门房，役夫，摇铃

的做饭的，哪个不是戴罪之人。论及底线与大节，或许还真应该有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时而异之必要，不然的话，梅兰芳前面的“蓄须明志”及稍后参与“祝捷演出”，有何差别。也许，还须为普通人另设一底线——即有饭吃与没饭吃，常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真正具体轮到个人头上，难免或有颠倒“失节事小，饿死事大”。话不中听，却多有事例为证——此处失节亦并非特指“卖国卖身”之大节焉。

谷林老人《检得旧刊说因由》，讲到俞平伯于沦陷时期北平的《艺文杂志》发表文章，被远在昆明的朱自清知道了，“他来信劝我不要在此间的刊物上发表文字，原信已找不着了。我复他的信有些含糊，大致说并不想多做，偶尔敷衍而已。他阅后很不满意，于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又驳回了。此信尚存，他说：‘前函述兄为杂志作稿事，弟意仍以搁笔为佳。率直之言，千乞谅鉴。’标点中虽无叹号，看这口气，他是急了。非见爱之深，相知之切，能如此乎？”俞平伯说“北平沦陷期间，颇有款门拉稿者，我本无意写作，情面难却，酬以短篇”。此类投稿给刊物的平常小事，在朱自清的眼里都是大事，若设此为底线，怕没有几个人洗脱干净。朱自清是把小节视为大节的知识分子，不然在美国救济粉中饿死的就不会

仅止他一人了。俞平伯到底还有些家底，虽然一度曾穷困到“余亦感经济困难，余妇乃有在家创办交卖会之举，取家中及亲朋处无用旧物标价售卖，酌取手续费”的地步，正如谷林所论：“此其所以尚可不写文章还能养亲而糊口欤？”沦陷八年之久，北平与上海不可能成为空城，留下来和走不了的人们，以各种方式谋生养家，就是为了能够活下去希冀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另有《古今》编者周黎庵说的一段话，也是耐人寻味的：“太平洋战起，梅兰芳适避地香港，他的‘蓄须明志’，恐怕是在香港开始的。蓄了须表明不能再唱戏了，这对本国人无异是骗小孩的手法，但对日本人却很有效力，所谓‘君子可欺以方’，对那些蠢如豕鹿的日本军人倒也‘可以欺方’，居然蓄了须四年之久。”周黎庵还说了认识梅兰芳的经过，时间和“文化人结婚”的时间对得上。

著名学者所说的“底线”，不适宜大多数人群；著名学者所说的“可不予计较”的“小节”，倒是应列入“底线”之一，欺人容易欺世难，齐白石在那八年不卖画给日本人，但卖给中国人后中国人又转卖（送）给日本人，他又怎么着。我从小受的教育是直线教育，非黑即白，非忠即奸，看问题凭直觉，

横看竖看我总觉得梅兰芳不该掺和“文化人结婚”这样的场合。虽说关于文化人结婚这等大事，在当时是上佳的新闻，在今日是上佳的资料，可是一旦将这样的报道置回历史现场，马上会引起的争论无疑就是“在历史大翻覆之际的痛苦抉择”的那些文人值不值得人们心怀“了解之同情”或“理解之同情”？此处先说这几句不着边际的话，实是因了此文在腹内打稿的当口，再适时不过地读到了散木先生的大文《读〈年谱〉》，散木先生读的是《龙榆生先生年谱》（张晖撰，学林出版社2001年出版）。龙榆生是学界公认的词学大师，又非常不幸地在那场“历史大翻覆”中“卖身事伪”，终于成为像周作人一样的“惜其不识相”（夏敬观语）的文化名人，连累得一批真心喜欢他们学问的人在议论他们时，总要花费心思在“学问”与“道德”之间斟酌最适合的词句，以至于我在读此类文章时私心里常常忘记了基本事实而被作者煞费苦心经营出来的“鸣冤抱屈”之词句暗暗叫好。我们这一辈看过婚礼场合里那些人的名字后，自会有惊诧之感，仅是胜利后被处决的即有梁鸿志（1946年11月9日枪决）、梅思平（1946年9月14日枪决）。

柳雨生的《文化人结婚记》刊在1943年4月号《杂志》，记

的是周黎庵穆丽娟婚典大场面；一年后又另有文载道版“文化人结婚记”刊在《古今》四十三、四十四合期上（1944年4月），文章的题目却是《三十三年三月三日三时》，记的是朱朴与梁鸿志的千金文若的婚典盛况。二文相比，柳文短得多，文文却长得多（长出一倍还多），文载道喜欢把文章写得尽可能的长，长文有长的好处，这样的纪实文字越详细史料价值越高。这里有一个问题，由于朱朴迎娶的不是平民女子而是权倾一时的梁鸿志的千金，所以怎么瞧文载道的行文口吻怎么感觉有献媚的味道，连题目也透着“讨好”之意。后人评说文载道文风学的是周作人，此说只看到了表面，周无论如何是不会去写此类品格的文字的。尽管我特别觉得这篇文章有用有意思，可是我仍然认为这是文载道的一次大的败笔，替他惋惜，为此他损失不小，此文从不收入他的新旧集子里，也许他也意识到看到的人越少越好，但终于还是有好事者于六十多年后在网络上给抖落出来了（详情见拙文《古今云物真悠悠——〈古今〉休刊特大号》）。对于自己几十年前的旧作，有人的态度是“愧则有之，却并不悔”，另有人该是“愧悔交加”亦未可知，乃或“悔则有之，却并不愧”也不奇怪。《杂志》的面目现在比较清楚了，不能算作汉奸刊物，而《古今》定

性为汉奸刊物，似乎已成铁案。陈平原教授最近有篇文章提到《古今》，措词是“汉奸所办杂志《古今》”（《燕山柳色太凄迷》），直接把朱朴汉奸了。小汉奸娶大汉奸的女儿，这水有多浑。《古今》的创办者朱朴二十年代末便开始追随汪精卫，并由汪介绍认识了陈公博。1939年8月汪伪“六大”朱朴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后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40年3月“国府还都”，朱朴被任命为交通部政务次长，后来还担任过组织部副部长。朱朴的这些职务日后足够定重罪的。有一点应说明，办《古今》时，朱朴已辞掉了这些职务，可是在我们眼里，汉奸是终身制，一朝失足，百身难赎。要想知道朱朴不办《古今》以后的情形和他到了香港以后的情形，过去是不大容易的，能看到的书刊很有限。我凑来几条资料，仍是大概的轮廓，再细的就寻不到了。一条来自朱朴的记叙，他在《胜利那天在北京》（1955年8月）中说道：“一九四四年冬天，我在上海结束了古今出版社的事务之后，举家迁往北京去。路过南京，到西流湾横庐去与（周）佛海道别；两人对饮了三杯白兰地之后，我下意识地似乎体会到将来的‘后会无期’，心中引起了莫名的感伤，而几乎下泪。……在北京，我实行过我的‘寓公’生活，饱食终日，悠然自得。当时我所交游的人，

大概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文字之交，如苦雨斋主人周知堂，以及瞿兑之，徐一士，谢刚主，王古鲁诸氏；第二类是书画同志，如百砚室主人许修直，以及陶北溟，邵厚夫诸位；第三类是酒肉朋友，这里面包括的人物可就多了，男男女女，纪不胜数纪。”

朱朴 1957 年 5 月回内地（与曹聚仁同行），受到规格很高的待遇，留下来的人好像倒没有享受过。5 月 16 日朱朴记：“十二时，誉老（叶恭绰）以国画院院长名义邀我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旧欧美同学会）午餐，陪客有文化部夏衍副部长，国画院副院长于非闇，暨徐燕孙，王雪涛，胡佩衡，惠孝同，吴镜汀，朱丹，启功诸先生，都是当代名画家，（只有齐白石与陈半丁二位老先生因病未到，）踉踉跄跄，颇极一时之盛。”朱朴念旧，除了寻游旧迹，饱览宫藏古画，暇时便走访《古今》旧友，在《北京十日》中他记着：5 月 11 日，“驱车前往西城八道湾拜访周启明先生，相见惊喜，恍如隔世。原来他近患高血压症，三月前几濒于危，现虽已好转，可是医生仍严嘱他见客谈话不能超过二十分钟，因此略谈后即行告辞，约他日再来。”5 月 19 日，“得徐一士先生书，即往宣外校场四条拜访，他亦患高血压症，似较知堂老人更为严重。相见兴奋，